

浙江新石器时代研究概述

李信 何春慰

翻开古代文献，浙江的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越国的建立，而在此之前的浙江，则往往被斥为“荒服之地”。随着近代考古学的传入中国，才使湮没不彰的浙江史前文化重见天日。尤其是建国后野外考古的蓬勃开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不仅揭示出浙江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已有着辉煌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且还证实当时的原始先民曾对中外原始文化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早在明代正德年间，海宁就有一批石器出土而为时人笔记所载录。本世纪初慎微之在湖州钱山漾采集到不少史前文物，然多未引起世人关注。直到1936年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在余杭良诸镇附近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在杭州老和山下（原称古荡）进行了考古发掘，才第一次拉开了浙江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序幕。施氏以出土文物为据，率先指出：“浙江古代已孕育很早的文化，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夏商之世，文化更灿烂可观。”这“为一般墨守陈规旧式史观的人所梦想不到的”新说，曾震撼了当时的史学界（《良诸—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浙江省教育厅1938年出版）。慎微之甚至主张“中国之文化，起于东南”（《吴越文化论丛》，江苏研究社1937年出版）。尽管某些论点有失偏颇，但此种不为传统观念所束缚、勇于探索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新中国建立后，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通过对全省进行了文物普查后，得知新石器时代遗址几乎遍及浙江各地。同时发掘了诸如湖州钱山漾、邱城、嘉兴、马家洪、杭州老和山、水田畈、余杭良诸、瑞安山前山、淳安进贤等著名遗址，发表了不少考古发掘报告和调查简报，提出了许多崭新的学术观点。尤其是钱山漾遗址的发掘，第一次把以黑陶为代表的良诸地层和含几何形印纹陶为代表的地层区别开来。这是后来确立良诸文化命名的基础。当时不仅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考古学者，为浙江考古事业的发展奠定下坚实的基石，而且还出版了印制精美的《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汪济英针对五十年代初考古学界主张良诸黑陶是受山东龙山文化影响而发展起来的观点，指出“良诸黑陶有它独特的风格”，“决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良诸黑陶又一次重要发现现代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2期）。沙孟海在《略谈浙江出土的·石铎》（《考古通讯》1955年第6期）文中，主张良诸文化常见的“石铎改与其后的越族有密切的关系。陈左夫则对良渚玉器进行了探讨（《考古通讯》1957年第2期）。姚仲源、梅福根在《浙江嘉兴马家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与考古》1961年第7期）文中认定马家洪遗址与邱城、桐乡罗家角和海宁彭城遗址等，均属于同一文化系统，仅有早晚不同的关系。

如果说六十年代以前主要局限于编写考古发掘和调查报告的话，那么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浙江考古学者的眼光已注重于区域文化的综合研究和考古学编年，随着江浙沪田野考古发掘新资料的不断涌现，越来越显示出太湖流域史前文化浓厚的地方色彩，加上自1972年以后我国陆续公布了一批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表明良诸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3310年至前213.年之间，因此而彻底否定良诸文化由龙山文化传播而来的说法。1977年夏鼎又建议把太湖流域早于良诸文化的类型定名为马家洪文化。牟永抗、魏正瑾则根据江浙沪著名遗址的地层迭压关系及其文化内涵研究，提出了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序列是：马家洪文化—裕泽文化—良渚文化。并对马家洪文化、裕泽文化、良渚文化的特征和年代进行探讨，指出太湖流域的史前文化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家洪文化和良渚文化》，《文物》1978年第4期）。

尤其令人振奋的是：1973年夏在余姚发现了举世瞩目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把浙江的新石器时代一下子上溯到七千年前，当消息公布之后，立即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并被誉称为“七千年前的文化宝库”。该遗址经1973年和1977年进行了二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和动植物遗存。其中数量巨大、保存完好的栽培稻遗存，榫卯形式多样的木结构建筑遗迹，独特的陶器群，丰富多采的艺术品，悠久的纺织、髹漆和凿井技术与舟揖的出现，以及多达61种的古动物遗骨，不但对考古界、历史界的研究具有戈少寸代的重大意义，而且对农业史、建筑史、纺织史、造船史、科技史、宗教史、艺术史、音乐史和古动物、古植物、古气候、古地理与水文的研究，也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同类遗址中都是十分罕见的（《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等）。继河姆渡遗址发掘之后，1979年又对桐乡罗家角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再次获得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和动植物遗存。其第四文化层采集标本经测定距今拼代已达七千年，把马家洪文化的编年又提前了一段时间，《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

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 1981 年出版）从而揭示地处长江下游地区的浙江，早在七千年前已有着辉煌灿烂而又丰富多采的原始文化。

八十年代以后，众多学者既深入研究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洪文化和良诸文化，同时又进而探讨了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与传播、中国玉器时代和中国文明的起源及海外文化交往等重大课题。牟永抗等夕、《江浙的石犁和破土器——试论我国犁耕的起源》以《农业考古》1981 年第 2 期）对石犁和破土器进行了复原研究，提出“远在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就发明了犁耕”的主张。姚仲源则就罗家角遗址与马家洪文化的关系作了探索，指出马家洪文化应源于罗家角类型（《二论马家洪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牟永抗就浙江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综合考察后，主张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可划分为杭嘉湖、宁绍、金衢和甬江水系四个地区文化类型（《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认识方》，《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4 年出版）。刘军则再次强调河姆渡遗址一、二、三、四文化层是一脉相承的，应视为一个文化整体《河姆渡文化的再认识》，出处同前）。毛昭晰、梅福根也对河姆渡文化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文化交流》1986 年创刊号）。汪济英主张河姆渡文化只能包括第三、四文化层，而第一、二文化层实应看作是河姆渡文化（三、四层）和马家洪文化（早、中期）交融；亡合的结果（《良诸文化的回顾与探讨》，《良诸文化》，余杭市政协编，1987 年）。游修龄根据河姆渡发现的大量稻谷，认定尼泊尔以东的阿萨姆、缅甸、泰国和中国云南是栽培稻起源地，传至太湖地区形成独特的内容丰富的中心，并支持了稻作文化从太湖地区出长江口渡海东传日本的观点（《太湖地区稻作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中国农史》1986 年第 1 期）。王心喜甚至断言“水稻只能从江南地区由海路输入日本，除此别无他路”（《江南地区远古居民航渡日本试论》，《海交史研究》1987 年第 2 期）。林华东在《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与东传日本》（《农业考古》1992 年第 1 期）文中，提出稻作农业的出现应具备天时、地利和人为（文化较发达的原始先民）三大要素，指出长江中下游地区才是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传入日本的稻米之路应是：长江下游—山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

1986 年和 1987 年在余杭反山和瑶山发现了大型良诸文化墓地和祭坛，出土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良诸文化精美玉器，是良诸文化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因而在学术界掀起了良诸文化玉器研究热潮。王明达在《浙江余杭反山良诸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 年第 1 期）中，以为能够驱使大量劳力构筑大规模的专用墓地者，足以说明墓主人是一批部族显贵，或为巫现，或为军事酋长之类特殊阶层。丙国耀、牟永抗在《余杭县瑶山良诸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出处同前）中主张以祭天礼地为主要用途的祭坛和布列于土坛上的 12 座墓葬，“可能出于同代人之手”，墓中“埋葬的就是巫现”，“可能也是祭祀的对象”。董楚平指出良诸文化的“神人”与显贵者的衣冠文化十分雍容典雅，更接近中原商周时代的神人与贵族的气派，此中信息大可寻味（《东南文化》1988 年第 3、4 合期）。林华东则率先提出瑶山良诸文化祭坛与墓葬并非出自同代之手，是“祭坛废弃后被用作氏族公共墓地”的（《瑶山良诸文化祭坛小议》，《东南文化》1988 年第 5 期）。牟永抗又对良诸文化玉器中的玉琮研究，认定其祖型可能是与“图腾崇拜有关的某种物体的转化物”（《良诸文化玉器·前言》，1989 年）。刘斌认为玉琮应滥觞于图腾柱（《良诸文化玉琮初探》，《文物》1990 年第 2 期）。林华东在《论良诸文化玉琮》（《东南文化》1991 年第 6 期）文中主张玉琮实应源自玉臂圈（镯），它是寓宗教、装饰、仪礼、权力于一体的复杂而特殊的玉器，继而提出良诸文化末期应已出现了方国。牟永抗、吴汝作通过对中国各地出土史前玉器全面考察后，对张光直提出的“玉器时代”新说进行论证，认为：玉作为非实用性的生产工具和专用玉质礼仪制品，标志着以等级为核心的礼制的开始，象征着持有者的特殊权力和身份，“这正说明了玉器时代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时代”（《光明日报》1990 年 7 月 4 日）。戴尔俭在《玉器时代献疑与美感探源》（《东南文化》1992 年第 2 期）文中，认为主张在中国进入青铜时代之前还存在着一个玉器时代的说法是不恰当的。因为玉器并非实用性工具和武器，同时在中国出土也不具有普遍性，它充其量也只是文明前夜的文明因素之一。

值得重视的是：1987 年余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还编辑出版了《良诸文化》一书，收录 1986 年 11 月在杭举办的“纪念良诸文化遗址发现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文章 20 多篇，研究内容涉及良诸文化的内涵、分期、年代、性质和来龙去脉等领域。1989 年江浙沪考古学者通力合作，编撰了《良诸文化玉器》一书，收有彩色图版 239 幅，由文物出版社和香港两木出版社出版。此书拍摄技术高而又印刷精美，是良诸文化玉器研究的珍贵史料。林华东专著《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出版）一书，全面而系统地揭示了河姆渡文化的内涵，立论中肯而严谨，既注重物质文化研究，又剖析了河姆渡先民的精神文化世界。同时还阐明“河姆渡人”对中外古代文明演进所作出的贡献，指出长江流域也是中华原始文明的又一摇篮。此书分别荣获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和省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以及浙江省 1991-1992 年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